

理性化與資本主義

——韋伯與韋伯之外

高承恕 著



高承恕著

理性化與資本主義

——韋伯與韋伯之外——

理性化與資本主義——韋伯與章伯之外

77.5.0846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初版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定價：新臺幣一五〇元

著 者 高 承 恕
發 行 人 王 必 成

出 版 者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臺 北 市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561 號
電 話 : 6422629 • 3940137
郵 政 劃 撥 帳 戶 第 0100559-3 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 11017 •

獻 紿 敬 愛 的 父 母 親

春天的雨

——代序

以前總覺得文章寫完了，最後再寫個序好像有點多此一舉。如今到自己面對自己的東西，雖然不是什麼石破天驚之論，只不過是這些年心路歷程的一些痕迹，卻覺著有些話想說，而且是很誠意地想說。回頭看過去的摸索，所做到的實在是很有限。然而儘管是如此，心裏真的有許多的感激。這些機緣、這些背後的支持，就像春天的雨水，它滋潤了學習中的生命。

大二那年冬天，杜維明老師回來教「文化與社會」，開始第一次接觸到韋伯，之後跟著練馬可老師 (Mark Thelin) 唸韋伯，寫論文。大學啟蒙時期所形成的興趣，在日後雖然有起有伏，忽明忽暗，二十年來竟是尋尋覓覓的一條主線。回想起來，在當時對韋伯的興趣其實是一種莫名的吸引力，就好像在黑夜裏遠遠地望到一點燈火，藉著年少的心，就一路往那方向去了。如今想來，沒有一點後悔，反而愈覺樂在其中。這是緣份，更是感激。

在美國的學習過程是比較迂迴的。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似乎已經離開了對韋伯的思考。從現象學到哈伯馬斯 (Jürgen Habermas) 的批判理論。有些東西在當時純粹也只是好奇，或是想在

當時流行的「實證論式的社會學」(positivistic sociology)之外，找條自己有興趣的出路。隨著時間的渡過，有些理念已經變得很遙遠了，然而有些卻不著痕迹地變成日後與韋伯對話的泉源。回想起來，好像計劃之外的總比計劃中的多。人生的路是如此，學術的路也是如此。

回國以後，由於在學校裏教的是社會學理論，這正好給自己一個重返古典社會學理論的機會。在教室裏，面對著學生們年輕而熱情的臉孔，有些問題愈來愈迫切了。到底這些古典的、現代的西方理論對我們具有什麼意義？這不是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但在這樣的關懷下，卻讓自己逐步走向歷史的路子，拾回對韋伯的興趣。其實轉向比較接近歷史的路子是很自然的。在古典的社會學裏，有那一位大師不是將他的思想根植在西方的歷史傳承中？只是韋伯似乎顯得特別的突出。在課堂裏，也越來越體會到，愈是把歷史背景交代清楚，也愈能把那些冷冰冰的理論還以熾熱的生命力。透過歷史的理解，我們漸漸能掌握其問題關懷之所在，意義關聯之所在。

說實在的，自己完全沒有史學的訓練。之所以會走上這樣的路子，還是得著另外的一番機緣。這種子是當年在哥城的好友嚴瑞源所播下的。一九七七年去德國寫論文，那時瑞源已去了牛津。我們倆走在冬雨後靜靜的石板路上，瑞源興高采烈地跟我談法國史學的「年鑑學派」。那是第一次聽到這派「新史學」。很好奇，卻也完全陌生。只是有個印象，這派史學是把經濟、社會與歷史擺在一體，好像比自己當時在寫的純理論性的東西來得更寬闊。之後瑞源又陸續寄了些有關的書及文章給我，但那時心裏

還正忙著「批判理論」裏的一些問題。這些書也就在書架上擋了好幾年。回到東海，載爵跟英文都是讀歷史的朋友，加上一羣執著的學生，在課裏與課外就憑著那點理想，開始讀西方的歷史。那真是段令人懷念的日子，知識的吸引和著年少的熱情，在爭辯與笑語中，埋下的種子在小小的書房、暖暖的研究室裏發芽、長大。在一片開闊的歷史天地裏，社會學的一些鬱結竟化解開來了。「理性化」的問題也好、「資本主義」的問題也好，都不再只是抽象的理論。擺回西方的傳統與現代來看，這裏面都有歷史的血肉。

我對我的學生們心裏一直有著感激。其實在這條摸索的路上，本來注定是要寂寞的。然而在與他們一起熱情的討論裏，這一切都變得是那麼的生動！我心裏很明白，假如不是跟學生在一起，根本讀不完韋伯那長長的〔經濟與社會〕，也更沒有可能「查」完布賀岱那三大冊〔文明與資本主義〕的「經」！這些文字裏都有我的學生。而這些文字正是要讓我自己、我的學生們去超越。

在生活裏受到太多人的照顧，都想藉此說聲謝謝。然而這本書太小，即使是誠意的，也好像不大相稱。這就一一擺在心裏。而父母恩的無限，更不是用言語所能表達一二。我盼望他們覺得高興、覺得安慰。這本書獻給我親愛的父母親。這二十年來，瑩妻一直是與我並肩携手地做同樣的工作，那份年少時的理想還是那樣的動人，我們仍然堅持。而這些讀書及學習的歲月也都點點滴滴地與敬賢、敬倫分享。我們都還有憧憬。謝謝敬賢的封面設計，還有敬倫的 Dire Straits。

春天的雨一來，水仙真的就從地裏鑽了出來。只是歐洲的春天卻不見雷聲。驚蟄原來是中國的季節啊！

高承恕

一九八六年復活節前於比利時荷蘭大學社會系

目次

春天的雨——代序.....	i
從對馬斯·韋伯的再詮釋談歷史研究與社會學的關聯.....	1
布賀岱與韋伯——歷史對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的意義.....	21
西方「現代資本主義」興起問題之重探——韋伯與華勒斯坦 論點之比較.....	51
科技發展對社會文化的影響——韋伯與哈伯馬斯的論點.....	101
「理性化」的困境及其超越的可能性——韋伯與哈伯馬斯對近 代西方社會之批判精神.....	127
對「理性化」的再思考——韋伯與韋伯之外.....	155
韋伯論點與東亞發展——理論與方法上的初步反省.....	203
附錄 社會科學「中國化」之可能性及其意義.....	223
名詞索引.....	243
人名索引.....	251

從對馬斯・韋伯 (Max Weber) 的再詮 釋談歷史研究與社會學的關聯*

一、問題的界定

作為社會學傳統的主要奠基者，馬斯・韋伯 (Max Weber) 的重要性及其貢獻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在社會學傳統中，韋伯也是曾經引起最多的爭論與誤解的一位。尤其是有關方法論上的討論以及對於西方近代資本主義興起的解釋更是議論紛紛。時至今日也還不能說是已經有所定案。在過去數十年中，許多社會學家根據他們自己的特定觀點對韋伯加以詮釋，從而希望進一步建立其理論體系或經驗研究之理論架構，其中尤以柏深思 (T. Parsons) 最具有代表性。柏氏結構功能的社會學理論基本上便以韋伯的理論為源頭之一^①。而柏深思對韋伯的註釋在相當長的一段期間也曾左右了美國社會學界對韋伯的瞭解。在五〇年代、六〇年代不論是同意的觀點也好，相反的觀點也好，為墨頓 (Robert Merton) 有關新教徒與近代科學的研究，貝拉 (Robert Bellah) 有關德川時期日本宗教的研究，麥克禮蘭 (David McClelland) 有關成就取向 (achievement orientation) 的研究等，基

* 本文初稿曾於民國七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之「歷史與社會變遷」研討會上宣讀，作者感謝黃俊傑教授的批評與建議。並於民國七十一年五月刊於〔中國社會學刊〕第六期。

① 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8, pp. 473-640.

本上皆是從類似的觀點出發^②。然而最近十年來由於韋伯的一些重要的原著，包括：〔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史坦姆勒之批判〕(*Critique on Stammler*)、〔羅夏與尼斯〕(*Roscher and Knies*) 陸續被完整的翻譯出來^③，使得我們能够從一個整體的角度來對於韋伯的理論與方法作一瞭解。基於這種新的瞭解，我們發現，過去在美國社會學界中存有許多對韋伯的誤解^④。這種誤解不但曲解了韋伯的原意，把問題給誤導了。更嚴重的是造成了社會學與歷史的分離，而又因這種分離形成許多社會學理論上與方法上，以及實質問題瞭解上的不當後果，有鑑於此，本文企圖對韋伯加以新註重釋。藉著對其方法論的重估，把西方現代資本主義興起之間題擺回一個整體歷史的系統裏，再認識其本質及意義。最後再從實質的歷史問題的探討回過頭來思考社會史研究與社會學的關聯。

二、韋伯的社會經濟史研究與社會學

一、方法論的重新澄清

有關韋伯方法論的討論是不計其數的多，然而大部份的社會學者在過去討論其方法論時多是從實證論的觀點出發。因之韋伯

② Robert Merton,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8.

③ Max Weber, *Roscher and Kn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Max Weber, *Critique of Stamml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④ 在此主要是指結構功能學派的學者而言。

方法論中的主要概念，如理念類型 (*ideal type*) 的建構及詮釋瞭解 (*Verstehen, 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 的運用多被評價為一種不够科學、無法量化、不能運作化的方法。在實證論的尺度下，這種方法自然便被視之為初級的或是較為低層次。即使是少數一些對韋伯方法論立場較為同情，也充其量是肯定其方法上人文精神的價值，但基本上仍是認為韋伯的方法論是不足的，而將之視為一種輔助性的工具。在最近的發展中，現象學的學者們算是最能正面地欣賞韋伯的立場了，然而即使如許滋 (Alfred Schutz) 亦未能够把握韋伯方法論的真正精神，反而將「意義的瞭解」的問題局限在主體的認知上來談^⑤。這許多誤解雖然其立場與觀點各異，但其癥結之所在卻是相通而一致的。那便是因為基本上皆未能够把韋伯方法論中歷史的面向加以適當的掌握。本文將針對這種缺點，將韋伯的方法論擺回其歷史的系絡中來瞭解，進而看其如何運用在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分析上，指出社會學與社會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問題。

韋伯方法論的運用及理論的建構主要皆是針對一個歷史問題的思考：此即是對西方如何成為今日之西方之思考，也就是西方近代「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 之歷史淵源及其演變之探討。基本上韋伯的分析便是從這歷史文化的問題出發，而其努力最後也是企圖希望能夠掌握此一歷史發展之意義。此一主題如果不能掌握，不但對韋伯之曲解在所難免，對韋伯之理論分析的實踐意義亦無從瞭解。這種曲解在柏深思的理論便是十分的明顯。柏氏由

⑤ Alfred Schutz,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

於無法掌握此一歷史主題，只是一廂情願地想踏在韋伯等人的肩膀上去建構其行動理論的一般體系。而其理論體系用來解釋所謂「現代化」的過程的結果卻是一套看似具有普遍解釋力，實際上只是一些相當空泛的概念的組合。別的問題不談，至少就韋伯本身的立場而言，韋伯從不曾企圖建立一套自歷史文化脈絡中抽離的一般理論體系，更不認為其理論分析能够或應當被放之四海地去被「驗證」。從韋伯的觀點來看，社會現象、歷史過程之探討其目的不在於理論體系本身之完成或普遍通則之發掘，而是在於歷史意義之瞭解，以及藉著歷史意義之瞭解，我們能夠獲得一種鑑往知來的啟蒙^⑥。這種深具實踐意義的啟蒙精神，在其「學術作為一種天職」(Science as a Vacation) 及「政治作為一種天職」(Politics as a Vocation) 兩篇論文中便展露無遺。如是觀之，韋伯方法論之運用與理論之分析基本上便是啟發性的(heuristic)，是達到歷史意義之掌握的手段。為了進一步將這些問題加以澄清，下面將就韋伯方法論中的「理念類型」(ideal type)、「詮釋的瞭解」(verstehen)，以及「選擇性的親近性」(elective affinity) 加以討論。

如果「理念類型」的建構是用來作為尋找社會歷史現象通則的工具，「理念類型」便只是在理論建構過程中進一步形成經驗命題(empirical propositions)的步驟之一而已。但是假如把它擺在一個歷史意義的瞭解上，理念類型的運作便呈現了另外一種的面貌。我們如果從整體的角度來瞭解韋伯的話，他原來的意義顯然

⑥ 這裏對所指的「啟蒙」與一般所指「啟蒙運動」的涵意有所不同。「啟蒙」意指行動者透過歷史、社會現象之瞭解與反省，而在其實踐行動上作一較佳之個人選擇。

是指向後者。在基本定義上我們都知道，所謂的理念類型是基於研究者價值關聯(value relevance)的取向，在面對歷史現象時，選擇某一特定之現象，根據經驗事實將該現象中之主要特徵加以片面之強化，而構成一個分析的工具。它不是單純地對於現象本身加以敍述，因為它勢必經過理念思維的運作將特徵挑選出來並加以組合，但它也不單純只是研究者主觀的選擇或是邏輯上的推理，因為它必須根據經驗事實。它源自歷史現象，形成之後，又回過頭用以分析歷史現象。在後面所討論的資本主義問題，「現代資本主義」便是韋伯用來分析比較資本主義的「理念類型」。其最主要之目的是在於如何掌握此一影響西方命運之發展，及其在整個西方之歷史文化系絡中所呈現之意義。換言之，韋伯並不像後來的一些社會學家企圖進一步地建立一個有關資本主義之興起與發展之一般理論 (general theory)。從韋伯的觀點來看，此一「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理念類型之形成，完全是對應此一繁複而獨特之歷史現象而發。當我們談資本主義中另外的問題，或資本主義在其他社會文化傳統中的發展，就可能需要建構另一理念類型來作為分析與瞭解的工具。理念類型本身只是我們在面對歷史實體之無限性時所運用的有限工具而已。當我們扣緊歷史面向來看時，一個「理念類型」的適當性的判準便不是在於其「經驗之驗證性」，也不在於其「普遍之解釋力」，而是在於能否得著有意義之詮釋。對韋伯而言，從理念類型進一步抽象為通則性的一般理論勢必將歷史系絡加以剝落，而這種剝落雖然在表面上看起來是提高了其理論之一般性或通用性，實際上卻是對於歷史實體的一種扭曲。

將理念類型的問題加以初步的澄清之後，我們可以更清楚地明白為什麼韋伯在其方法論中要強調「詮釋的瞭解」的重要性了。韋伯在思想上雖然受到德國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影響，特別是狄爾泰(W. Dilthey)所強調的在人文社會現象中的「瞭解」。但韋伯對「瞭解」此一方法論上之問題與狄爾泰有顯著的差別。狄爾泰基本上是個哲學家，而韋伯卻更具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的性格，韋伯的史觀以及對歷史的瞭解是來自其具體而真實之經驗研究。因之，韋伯對於方法論中「瞭解」之界定，不是視為一種「將心比心」的移情作用，而是一種根植於歷史文化脈絡中的詮釋。換句話說，「詮釋的瞭解」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我們能够將某一現象置之於其歷史情境中來掌握其意義。若脫離其原有特定之歷史情境，詮釋的瞭解便不可能。這種瞭解，不可避免地具有其片面性，因為它基本上還是研究者基於其價值關聯上之選擇，從某一觀點，針對該歷史現象之某一部份而發。這詮釋的瞭解有其不完全性，也有其開放性(openness)。就方法論上而言，這與前述之理念類型具有相通之性格，而這種相通之性格皆源自韋伯對歷史面向之強調。歷史實體是無限的，研究者所建構的理念類型，所做的詮釋的瞭解是有限的。理念類型的運用便是希望在我們面對繁雜的歷史現象時能幫助研究者去蕪存菁，獲得較佳之瞭解。但是基本上，適當之意義的瞭解，仍然是繫之於對歷史現象本身之認識。自然，這種詮釋的瞭解絕不可以加以一般化或通則化。通則化的結果也勢必是對意義本身的曲解。實證論者不明此理，於是便將這種歷史意義的瞭解視為不科學的，或是視之為僅是發現問題，形成假設的一種前期手段⑦。對韋伯來

說，「詮釋的瞭解」卻是研究社會歷史現象絕不可缺的方法。此方法之運用其目的不在於「客觀性」之保證，而是在於歷史意義之掌握以及可理解的模式 (*intelligible pattern*) 之獲得。

順著前面討論的路子下來，我們可以在一較適當地探討韋伯方法論中另一比較為大家所忽略，而卻又是非常關鍵的問題——「選擇性的親近性」。這問題基本上是要處理各歷史因素間在特定之時空條件下之相互關係。此問題與韋伯所討論之「因果關聯之推論」 (*causal imputation*) 以及「客觀可能性之判斷」 (*The judgement of the objective possibility*) 有密切之關係。然而在過去多數的社會學家由於沒有注意到所謂「選擇性的親近性」的概念，而把韋伯對「因果關係」之看法曲解為一種實證論式的因果觀，使得韋伯的方法論出現了一種莫需有的矛盾；亦即是其「意義的瞭解」與「因果分析」間的矛盾。

韋伯的「因果觀」與自然主義式的 (*naturalistic*) 因果觀是截然不同的。這在基本上根本反映著兩種不同的史觀 (*vision of history*)。自然主義預設人文歷史現象與自然現象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在其發展過程中具有規律性之法則，透過這種規律法則之掌握不但可以解釋過去與現在，並且可以在適當條件下預測未來。於是乎因果的分析便是主要在於這種規律法則之掌握。韋伯的史觀卻是不同的。他認為歷史的發展是具有其無限性及開放性。他不同意黑格爾、馬克思等人的看法。黑氏及馬氏所謂的「歷史發

⑦ Theodor Abel, "The Operation Called Verstehen", in H. Feigel and M. Brodbeck eds.,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3.

展之內在必然性」(the immanent necessity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在真實的歷史發展並不能找到證據。而自然主義的因果觀也只是一種相當天真的預設。即或我們在歷史經驗中發現一些規律，但這種經驗規律以及這些規律所具有的意義，皆需在特定的歷史文化系絡中來界定。從這觀點來看，韋伯所談的因果分析，實際上主要所指便是所謂「選擇的親近性」。透過經驗的考察，理念類型的運作，以及適當之詮釋，我們所要掌握的是在歷史的時空條件中，那些因素彼此較容易相互的作用，而產生特定的結果。因素與因素之間的關聯是有選擇性的。最重要的是，這種親近性並不是單純的變數間的關係，它必須在歷史文化的脈絡去瞭解。換言之，這種親近性的關係不是通則性的，基本上需視其所處之時空條件而定。當時空條件有所改變之後，這種選擇性的親近性便不一定能繼續存在。那時我們就得在新的歷史脈絡中去發現、去理解。這是一個相當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韋伯的立場顯然既不是實證論式的，也不是黑格爾或馬克思的辯證式的。前者的因果觀念是抽離時空條件的，而後者雖然強調歷史之意義，但由於認定在本體上歷史具有其內在的正反合的辯證發展，因之其因果觀亦是相當機械而帶有決定論的色彩，甚至可以說是相當地「非歷史」(ahistorical)。因為在其辯證邏輯中，歷史的演進是普遍而必然的。換言之，歷史發展的法則不是因為特定之歷史時空條件而能加以左右。基本上，黑格爾及馬克思對歷史的瞭解不是從歷史時空出發，而是從其歷史哲學來解釋。而弔詭的是，如法國當代史學大師拉果夫 (Jacques Le Goff) 所言：